

桑弘羊与西方重商主义思想之比较研究*

魏悦¹,李艳丽²

(1. 复旦大学 博士后工作站,上海 200433;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广州 510420)

[摘要] 重商主义代表了封建社会内部逐渐成长起来的商人阶级的观点。在西方,重商主义产生于14、15世纪,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反映。中国首倡重商理论的是桑弘羊。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考察,桑弘羊的重商理论和西方重商主义思想,既有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二者的异同,不仅展示了不同民族所面临的相同或相近的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重商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关键词] 桑弘羊;重商主义;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 F09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8)05-0076-05

重商主义学说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1](p376)},它从商业资本的利益出发,研究流通领域中商品货币运动,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逐渐成长起来的商人阶级的观点。在西方,重商主义产生于14、15世纪,兴盛于16、17世纪,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反映。中国古代首倡重商理论的是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年),在他之前,管仲、范蠡、白圭等人已把商业作为致富的事业,但没有提出独立的商业概念。桑弘羊继承了前人经营商业的思想,进一步引申发展为一整套重商理论。桑弘羊的重商理论与西方重商主义相比较,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价值取向、方法原则和文化精神的差异,也存在明显分歧。本文试图从经济思想的角度,对二者的重商理论作一比较,以期把握和印证中西古代经济思想的某些异同,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考察,桑弘羊的重商理论与西方重商主义既有相近的一面又各具特色。他们思想比较一致的地方,恰好表明人类经济生活的客观实践和理论反映自有较为普遍的共同性,即使相互隔绝、互不联系的场合也会发展出极为类似的理论观点。具体说来,二者的相似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货币是财富的一般代表

西欧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商业资本的活动范围空前扩大,社会各阶级对货币的需求迅速增长,货币成为财富的象征。作为商业资本代言人的重商主义者,“坚持交换价值的坚实的、可以捉摸的和闪闪发光的形式,坚持它同一切特殊商品对立的一般商品形式”^{[2](p148)},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代表。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其他各种动产是那么容易消耗,以致由这种动产构成的财富不太可靠;今年富有这种动产的国家,即使毫无输出,只要是奢侈浪费,明年就很可能缺少这种动产。反之,货币却是一个可靠的朋友,它虽然会由这个人转给那个人,但若能使它不流出国外,就很不容易浪费消耗。”^{[3](p2)}所以,货币是一国财产中最坚固、最可靠的部分,增加货币就是一国政治的最终目标。

重商主义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者把财富、货币、金银直接等同起来,认为一国拥有的金银越多就越富有,因而主张以贮藏货币的形式积累财富,严禁金银出口。法国早期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称赞货币是军事神经的看法,他说:“黄金比铁更有威力,所以大国都在寻找获得黄金

* [收稿日期] 2008-07-21

[作者简介] 魏悦(1972-)女,辽宁省沈阳市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
李艳丽(1982-)女,湖北省武汉市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的办法。^{[41](p77)}英国早期重商主义者约翰·海尔斯在其著作《论英王国公共福利》中,详细论述了保持和增加英国货币以求致富的措施。^{[4](p81)}恩格斯曾形象地指出,早期重商主义者“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妒忌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5](p596)}晚期重商主义者的致富原则是将货币投入流通领域,通过调节货币运动,达到积累财富的目的。“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地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资本却会不断增殖。……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币当作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回来。”^{[6](p596)}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明确指出,“国家对它们的财富,正像私人对它们的财产一样,不能因为他们有了货物就不敢再冒险了。也就是不敢拿钱来做买卖了。他们一定还会再拿出钱去换成货物的,这样才会增加他们的钱,并且由于这种不间断的和规律的由一种东西换作另一种东西的变化,他们就逐步富有起来了。”^{[7](p15)}托马斯·孟深刻揭示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职能,货币已被看做增加货币的手段。

和西方重商主义者相似,桑弘羊也把货币和财富等同起来,将货币视为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形态。^{[8](p79)}他说:“余结发束脩,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俭节以居之。俸禄赏赐,一一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盐铁论·贫富》)“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跼蹐之徒无猗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盐铁论·力耕》)桑弘羊认为自己所以致富,是积存了大量由俸禄而来的货币;长沮、桀溺所以贫穷,是因为“无百金之积”,商人所以富,是由于“或累万金”。由此可见,桑弘羊和重商主义者都把货币看做是财富的代表,以货币多寡作为衡量富裕程度的标准。这种观点自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不是纯主观的臆造。“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权力也日益增大。”^{[9](p151)}

二、商业是致富的本源

16、17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西方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商品流通总量和速度的增长牵动了工场手工业与城市经济的繁荣,为农

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准备了前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1](p371)}商品经济的发展唤醒了近代商业意识,商业化的行为原则开始快速渗透和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重商主义者从商业资本的运动形式G-W-G出发,研究财富及其增殖问题,得出了流通过程是财富的源泉的结论。重商主义者认为社会财富来自出让商品所带来的额外货币,即低价购买高价出售后得到的所谓“让渡利润”。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当时真正的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是商品流通的领域。”^{[2](p148)}为此,他们强调以商立国,保护商人地位。托马斯·孟指出商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7](p1)}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将商业置于首要地位,公开为商业利润辩护。“商业利润是正常的,因为如果不是为了追逐利润,谁也不肯出生入死,甘冒海上陆上的种种风险。”^{[4](p77)}商业化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从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说,繁荣的商业是开启西方新时代大门的钥匙。

与此类似,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惠商”、“宽商”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商业规模不断扩大,一般的贵族官僚也投资于商业经营,“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晋书·食货志》)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急剧变革的杠杆,人们的价值观念随之发生变化,“巧伪趋利,贵财贱义,贵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史记·苏秦列传》)“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具欲也。”(《史记·货殖列传》)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作为重商理论的倡导者,桑弘羊从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来为商业辩护。“商不出,则宝货绝。……宝货绝,则财用匱。”(《盐铁论·本议》)“山居泽处,蓬蒿晓埒,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谨。若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胸鹵之盐不出,旃罽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盐铁论·通有》)可见,没有商人则财富之源断绝,财物的消费也会缺乏。因此,桑弘羊否定了先秦以来视农业为富国之本的传统观念,提出商业是致富的本源。“贤圣治国非一

宝,富国非一道……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盐铁论·通有》)运用商业的不等价交换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就可以不劳而富,虽说“富国非一道”,实际上却把商业看成致富的真正本源,这是典型的商人阶级观点。

三、对外贸易是致富的途径

西方重商主义者从“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出发,认为商品交换是财富的源泉,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要想使商品交换增加一国的财富总量,就必须开展对外贸易。“通过对外贸易差额进入王国的金银是只与我们一起继续存在下去的货币,我们会以此致富。”^{[10](p99)}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对外贸易的每一笔交易都要保持顺差。孟克列钦坚决反对外国人在法国经营进出口贸易,力主法国政府应该保护和帮助扩大本国的对外贸易。“奢侈品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购买奢侈品就会使法国的黄金流往外国。”^{[4](p77)}奥地利官员菲利普·冯·霍恩尼克在《奥地利高于一切,只要她愿意》一书中对重商主义政策做了清晰的表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允许黄金和白银流向国外……居民应当消费本国产品……外国商品的进口应以本国货物支付,不要支付黄金和白银。”^{[11](p20)}晚期重商主义者强调总体上的贸易顺差,追求货币的总量积累。托马斯·孟指出:“货币建立贸易,贸易增殖货币,因此,投入流通中的货币越多越好,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财富和现金的手段,但是,我们应当遵守下列原则:我们每年卖给外国的货物总值必须大于我们所消费的他们的货物总值。”^{[7](p4)}“我们还要指出的,只不过是让我们的金钱加在我们的商品上面,使它们一块儿输往外国,从而我们可以获得更多得多的财富。”^{[7](p13)}意大利重商主义者塞拉同托马斯·孟一样,不赞成政府禁止货币出口。他说:“人们输出货币必有其目的,但不论货币输出的目的何在,总会给王国带回利润。”^{[12](p34)}晚期重商主义者反对禁止金银出口,保持贸易收支平衡的思想,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是17世纪后现代经济学的起点。

桑弘羊对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亦有充分认识,并积极地提倡。他说“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未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

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盐铁论·力耕》)桑弘羊认为治国必须善于应用轻重之术,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以轻换重,变虚为实,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支配地位。

四、国家干预是致富的保证

为扩大商业利益,最大程度地攫取财富,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干预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国王为了维持庞大军队和豪华的宫廷生活,日益需要大量货币,也开始关注加强商业资本的力量。对货币不断增长的需求,使得封建国王同重商主义者结成联盟。这一时期的国家干预理论是典型的商业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国家干涉是重商主义理论的主要部分。”^{[13](p61)}早期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主要体现在严禁货币出口方面,英国的约翰·海尔斯、意大利的格·斯卡菲等都坚持以立法手段增加货币财富,主张为本国商品建立贸易货栈,把货币保留在国内,不允许货币输出。^{[4](p81)}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当时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都颁布了各种法令,甚至严厉的刑罚,禁止货币出口。^{[4](p71)}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运用关税政策实现对外贸易的出超,托马斯·孟指出,“在财政政策上,国家应当采取恰当的政策,抑制国内的奢侈浪费,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本国的出口货物要少征税,有些要免税,以提高本国货物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对国内消费的进口货要课以较重的税,以此促成外贸顺差的形成。”^{[7](p4)}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施行了一整套国家干预制度,将国家干预主义思想推向最高峰。他按官署机构模式调整工商、外贸部门,使国家对这些部门的管理规章化;推行国家垄断控制军火、冶金、采矿、造船和公用事业;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权、烟草专卖权和皇家手工工场管理权等。^{[4](p79)}柯尔培尔的主张具有封建专制和国家垄断的特征。重商主义理论是国家干预主义的最初代表,封建王权成为推动和扶持商业资本发展的“拐杖”,直接催化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国家干预在中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实施始自桑弘羊执政期间。桑弘羊从商业富国的立场出发,采取积极的宏观政策,首先将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山海之利,广泽之蓄,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盐铁论·复古第六》);为开辟财源,又将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如盐、铁、酒等实行专卖,“大农之诸

官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史记·平准书》)与此同时,通过“设衡立准”“灸刺稽滞,开利百脉”(《盐铁论·轻重》)等措施,稳定货币和物价以利流通。桑弘羊的国家干预思想不仅为王权介入商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实践中也达到了增加政府收入的目的。“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

五、工农业是致富的基础

16世纪西方农业和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使重商主义者不仅关注商业,而且要求保护工农业,这是一个具有发展战略意义的视角。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维护农民利益,发展国内外粮食贸易。约翰·海尔斯提倡增加粮食生产,保证国内粮食供应,同时“把多余的粮食运往国外以换取大笔钱财”,否则,一旦国内粮食歉收,“我们就不仅会遇到物价上涨,而且也会看到小麦数量不足,不得不用高价向国外的若干地区觅购小麦。”^{[141](p70)}海尔斯把粮食生产看成满足国内食物需求的基础,指出要“更好地爱护庄稼人”,“从事农业的人愈多,各种食物的生产将更加普遍。”^{[141](p71)}孟克列钦要求法国国王注意农民的贫困状况,“农民是国家的双足,国家应特别关怀农民。……一国之富,不在于金银之多,而在于生活必需品。”^{[151](p32)}晚期重商主义者鼓励扩大出口商品的生产,扶植和保护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以实现对外贸易的出超。所以,晚期重商主义又称为重工主义。托马斯·孟指出制造业会给英国带来很大的利益,并且“对于输往外国的商品可以免税出口的话,这种制造业还会大大发展。”^{[41](p85)}孟克列钦主张建立新型工场手工业,改善法国工业品质量,把外国货物从法国市场上排挤出去。^{[41](p77)}柯尔培尔当政期间,采取各种办法鼓励本国工业发展,兴建了众多“皇家手工工场”,其中规模较大的先后由 68 个增加到 113 个。^{[41](p79)}塞拉在《略论无贵金属矿藏国家使金银充足的手段》一书中提出:“如果各式各样的和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能生产出超过本国需要的必要生活资料、享乐用品和奢侈品,就可以给国家换回充足的货币。”^{[161](p38)}从中可以看出,所谓“重商主义”并不是单纯地偏向“重商”或“重工”,而是将“重商”与“重工”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西方商品经济的发展。

与西方重商主义者类似,桑弘羊在强调商业富

国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工农业的重要作用。他说:“工不出,则农用乏……农用乏,则谷不植。”(《盐铁论·本义》)“工商梓匠,邦国之用、器械之备也,自古有之,非独于此。……百工居肆,以致其事。”(《盐铁论·通有》)桑弘羊指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相互依存,“农商交易,以利本末。”(《盐铁论·通有》)“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养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盐铁论·本义》)因此,“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盐铁论·本义》)“农工商协调发展,就可以实现‘民不困乏,本末并利。’”(《盐铁论·通有》)

桑弘羊的重商理论与西方重商主义思想尽管具有以上相似之处,但由于社会组织形态、生产方式和方法原则的差异,二者在具体实践中仍存在重大分歧。西方重商主义者将保存货币作为对外贸易的指导原则,反对货币输出。桑弘羊虽以货币为财富,但并不是把取得货币作为对外贸易的绝对目的,他仍然以货币为“末”,以供人们生活需要的物品为“本”。“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姜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缁,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羸驴駝駝衔尾入塞,驩驩駝马尽为我畜,驩韶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盐铁论·力耕》)进口多、出口少,商品不外泄,不仅可以“损敌国之用”,又可以丰富国内物品的供应。这种对外贸易思想,既不同于早期重商主义少买多卖以增加货币进口,也不同于晚期重商主义一味追求贸易顺差,而是大量出口黄金以换取更多的有用商品进口;在国内贸易方面,西方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内的商品交换不能增加一国财富,甲之所得,不过是乙之所失,只有对外贸易才能增加该国的货币总量。^{[41](p70)}桑弘羊从单个商人角度出发,认为个人货币增加即个人财富增加,所以,国内贸易可以增加一国财富。这是他和西方重商主义者的根本差异所在。桑弘羊代表的是封建地主经济上升时期的商人阶级观点,因此,他虽以货币为财富,却未能摆脱封建自然经济以追求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特征,“重商”的直接、主要的目的仍然是获取使用价值。西方重商主义者代表的是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间的商人阶级观点。

这一时期,商业的发展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运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迅速增加,顺应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跨越的经济潮流,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总而言之,重商主义的兴起从一个重要层面展示了古代中西方由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演进的曲折轨道。作为由经院哲学过渡到古典经济学的必要中介,重商主义构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前史,17世纪后商业意识和资本观念扩展到西方哲学、政治等各个领域,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重商、崇商精神,为世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桑弘羊的重商理论则与封建经济的农本思想不能相容,自始即遭到各方面的围攻和蔑视。在后代王朝中,虽不时被采用,但大都蜕变为封建国家的纯财政剥削手段。重商思想在古代中国昙花一现,没有上升为经济统治政策。这种思想取向和路径的差异不仅预示着中外经济思想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分道扬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西方经济由此拉开距离的一个明显标志。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 人民出版社,197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M]. 人民出版社,1962

- [3]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 商务印书馆,1983.
[4] 鲁友章,李宗正. 经济学说史[M]. 人民出版社,196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人民出版社,1956.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人民出版社,1972.
[7] 托马斯·孟.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M]. 商务印书馆,1997.
[8] 胡寄窗. 中国经济思想史(第 1 卷)[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 人民出版社,1972.
[10] [美]亨利·威廉·斯皮格尔. 经济思想的成长[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1] [美]福斯菲尔德. 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12] 胡寄窗,胡永刚. 政治经济学前史[M]. 立信会计出版社,1991.
[13] [英]埃里克·罗尔. 经济思想史[M]. 商务印书馆,1981.
[14] [英]伊丽莎白·拉蒙德. 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M]. 商务印书馆,1989.
[15] 漆光瑛,蔡中兴. 外国经济学说史新编[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16] 陈孟熙,郭建青. 经济学说史教程[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朱德东)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rcantilism between Sanghong Yang and the western ideas

WEI Yue, LI Yan - li

(Post - doctoral Statio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Mercantilism represents the idea of business class in feudal society. In the west, mercantilism was produced in the 14th, 15th century, reflec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natural economy to commodity economy. The first who proposed the theory of mercantilism in China is Sanghong Yang.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 thought, Sanghong Yang and the west have similar and different mercantilism, which indicates different nations face similar or different economic issues and which reveals specific cultural tradition and era spirit of mercantilism.

Keywords: Sanghong Yang; mercantilism; economic thought